



大会

Distr.: General
17 May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十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44

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

2005 年 5 月 13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 2005 年 4 月 5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特米阁下在巴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部召开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暂定项目表项目 44 的文件分发为荷。

贾瓦德·扎里夫(签名)

* A/60/50 和 Corr. 1。



2005 年 5 月 13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特米阁下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2005 年 4 月 5 日，巴黎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此次巴黎之行是我担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八年任期的最后一次海外访问，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知识瞭望塔，成为它的客人，我感到十分高兴。这个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大本营的宪章在前言中指出：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人类自有史以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为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争；……和平若全然以政府间之政治、经济措施为基础则不能确保世界人民对其一致、持久而又真诚之支持。为使其免遭失败，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

我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推动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建议，上面引述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这一建议的主旨。因此，我在最后一次海外访问时选择这一组织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的目标和宗旨是相同的。在我开始阐述手头的这一议题前，我想先感谢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阁下，感谢他好意为我提供了这一机会。

在联合国大家庭内，教科文组织一直是推动不同文明间对话的主导机构，在过去几年中，它在世界各地成员国的支持下，已就这一专题召开过几次重要会议。

与此同时，教科文组织解决了在概念上与不同文明间对话紧密相连的其他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 2003 年批准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议》，另一个是 2001 年颁发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根据这一宣言起草的一个文件草案现正在由教科文组织进行最后批准。一些国家和它们的领导人，特别是希拉克总统，尤其热切关注这一议题，这非常令人鼓舞。教科文组织不可以忘记希拉克总统在 2001 年 10 月召开的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开幕式上所作的深刻发言。阿尔及利亚在布特弗利卡总统的领导下，第一个签署了这一关于文化遗产的决议，这是我们第二次同时出席教科文组织关于不同文明间对话的会议。第一次会议是 2000 年在纽约召开的，出席会议的还有 11 位其他国家元首。

教科文组织致力于处理科学和生物技术涉及的伦理问题，这也表明，在 21 世纪开始之际，国际社会正在努力处理在过去没有得到充分考虑的问题。

总干事先生，

你决定把不同文明间对话定为教科文组织的部门间战略目标，并在战略规划中予以考虑。这明确表明，这一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贵组织处理的所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女生们，先生们，

2001 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对话年，而同年 9 月 11 日发生了令人发指的灾难，其后在全球引发了政治后果和其他后果，此外，有几个智囊团和研究中心以及国际政治机构有兴趣研究不同文明间的对话问题，这一切都应提醒我们注意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不仅是从理论辩论和实际学术考虑的角度来看，而且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想在此宣布，根据教科文组织宪章阐述的目标，我决定在我总统任期届满后，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实现这一极为重要的目标。我已经考虑成立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将欢迎各位政要、知识分子、改革人士以及相关的国际机构提供支助。我尤其希望出席本次令人难忘会议的各位提出建议，我欢迎你们在这次访问期间提出看法。我认为，我们应该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对话文化”的渊源。

各位尊敬的与会者，

呼吁不同文化和文明开展对话的真意何在？难道不同文明和文化不是一直在对话吗？我们的呼吁有没有任何新内容？很可能在座的大多数与会者都知道阿诺德·汤因比将文明比作传染病的格言。一般来说，文明从一个地理区域向另一个区域的扩散是显而易见的，几乎不用任何论证来佐证这一点。这种传播或扩散自古以来一直就有，其渊源与我们已知的任何人类文明一样古老。显而易见，在公元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呼吁采用早在我们共同商定采用公元纪年之前就存在的、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做法，是无法称之为创新的。因此，我要提请大家注意，我所指的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并不仅仅是不同文明间的相互“扩散”、“借鉴”或“影响”。

“影响”并不总是在人们意识到或自己觉察到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去施加影响或意识到自己正受到影响，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并不总是意识到或自己觉察到的。相反，很难设想在无意识或自己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进行对话。

如果我们承认“意志力”是人类存在的特征，并注意到意志力源于人的知识，那么我们可以推断有关人类生存的一个最主要的决定性问题的必然涉及人是如何认识自己和宇宙的。伊曼纽尔·康德正是从这一角度提出了他的三个基本问题。

人类的知识是用语言表达的，而由字词组成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约定俗成，而不单单是个人行为。语言有它们的历史，有它们发展、转变和最终演化成目前形式的历史。因此，任何言谈交流，即便它没有逐字重复以前的言谈

交流，并可能偏离它们，但它仍然源于它们，并与之交融，而且它不久就汇入昔日言谈交流的百川之流，继续奔腾向前，不断获得新生，流向未来。

由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每一次言谈交流只能根据其他一些言谈交流才能产生“含义”，才可为人知晓。虽然从生理角度上来看，听到雨水滴落、鸽子鸣叫或另一个人引声高歌可能没有什么差别，但从人文角度来看，这种比较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雨水滴落的声音的确持续不断，但它缺少“和音”。这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有意识的社会意愿产生的。这些声音并不构成语言。只有在语言中，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才能汇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存在，人类对自我存在的认识以及对其他人现在和过去的存在的认识，都是用语言表达的：语言的精髓在于它的交流能力。只有通过交流，通过对话，才能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历史，认识整个宇宙。

此外，对话也是一种伦理行为。通过在此特别提请注意伦理因素，我希望强调伦理行为的非功利主义特性。不适当强调这一非功利主义特性，任何追求功利的行为也很容易被说成是伦理之举。

进入伦理的王国，的确就是进入了人性的王国。功利，只有在与真理、美和伦理没有冲突时，才是“好的”。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最美的语言是柏拉图谱写的，他站在历史的顶峰，以最有哲理的语言和最有诗意的字句，体现了真理、美和伦理的和谐统一。对话集美学和伦理于一身，是真理的具体体现。

近几代人和下一代人对我们世界的思想、文化、诗歌和美学的渊源越来越不熟悉，这也对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利。事实上，如果没有佛教徒的微笑、基督徒的爱以及摩西对被压迫者的怜悯，没有波斯教的火与水，没有古兰经教义和华美，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失去了毕达哥拉斯的圣乐、柏拉图的完美形式、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政治和形而上学、柏罗丁的无处不在的远见卓识、法拉比、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的圣人智慧；如果没有苏哈拉瓦底的启示性直觉，没有希腊人的神圣愚行和独特智慧；如果没有波斯人汹涌波涛般的神秘诗篇或阿拉伯柔软似绸缎的抒情诗，或没有洁白如玉的樱花和日本俳句诗；如果伊本·阿拉比和梅斯特尔·爱克哈特的美丽心灵和追求美丽之心，那些令浪漫主义作家和艺术家骚动不安的夜晚和 18 世纪思想家启动的启蒙时代均不为人们所知，那么，生活是多么的枯燥乏味。事实上，如果没有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帕斯卡、克尔凯郭尔和柏格森，如果没有巴赫、贝多芬和莫扎特百听不厌的音乐，更广泛地说，如果没有绘画、音乐、雕塑、戏剧、诗歌和其他人类感知和文化产生的美学作品，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作为一个穆斯林，我认为宗教之美产生于正义之美，而不是反之。正义是所有神圣宗教的根基，因此，对宗教的任何解释，只要造成非正义，均有悖于宗教的真正教义。笃信宗教应以追求正义为本，而不是反之。

女生们，先生们，

对多种文明的历史和文化的无知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个敌人离我们太近了。要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就要在政治中进一步考虑到文化和伦理和它们的作用。我们不妨回顾，一些发言者已经注意到，自从 18 世纪以来，政治越来越缺少灵魂，越来越沉闷枯燥。当政治要顺从经济因素时，它就无法继续信守伦理美德，也无法维护人的尊严：它无法再主要密切关注人类的文化和艺术遗产。缺乏伦理和美的政治，不管它如何装腔作势，在保护人权方面永远不会有什么建树。真理、美和伦理是人权的支柱，诉诸暴政、造谣和不适宜地藐视反对者，是无法捍卫人权的。应该让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率先踏上争取人权的征途，让政治家们随后而行。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政治特征是它坚信文化和伦理关注高于政治关注。换句话说，它断言，要根据文化和伦理方面的考虑来理解政治和进行政治实践。当政治只是跟随石油气味而行，而不是依循伦理而行时，它是不会捍卫人权的：相反，它只会捍卫狼的权利，而不是人的权利。

就政治而言，要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就要深刻讨论诸如民主、正义与和平等概念。通过这种讨论，我们会商定相互都能接受的这些概念的定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躲过陷阱，不理所当然地作出建立在强权和支配地位基础上的、符合自己利益的解释。

请允许我表示，我赞成已故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所表达的观点。他从方法论以及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坚称对话和谈判有根本的区别。在对话中，提问比回答重要，不一定要通过夸大对方的缺点而使对手缄默不言。另一方面，在谈判中这样做是正常的。在对话中，我们随机而行，但在谈判中，我们试图按预定目标而行。在对话中，我们随时可以有改变，而在谈判中，压倒对方的意愿占上风。

亲爱的各位与会者，

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一届大会提出的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决议是一个重要文件，它不仅着重谴责这种无法原谅的可恶现象，而且还进一步建议对造成恐怖主义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作为一种沟通交流的形式，对话本身就把侵略与恐怖排斥在外。侵略本身就不进行沟通交流，是无声进行的，因此它只听从赤裸裸的暴力，而不听信逻辑，它没有留下任何相互理解的余地。支持侵略的人只求强迫他人按照他们的方法看问题，强迫他人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相互利益有多么大的根本冲突。这种排斥性程序的结果只能是一方增加仇恨和恐怖行为，而另一方则诉诸战争和屠杀。除了形式外，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在内容和实质上也否定战争和恐怖主义，重点求消除世界各地人类社会面临的大量疾苦：普遍贫穷、迄今还有许多儿童和成年人面临饥馑、环境遭到骇人听闻的毁坏、家庭体制受到威胁、缺乏道德、贫穷地区的青年缺乏教育，这些是我们必须要处理的一些优先事项。创建教科文组织的许多热爱和平的政治家们也同样关注其中的大多数问题。

在我最近访问非洲的过程中，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意识到本组织称为“非洲优先”的这一事项的紧迫性，特别是鉴于令人鼓舞的是，这个备受压迫的大陆上的民间社会没有采取激进手段，正在积极地迈向民主和改革。自我上次访问该大陆的 15 年以来，这些事态发展最引人注目。教科文组织的许多其他成员国也同样显示出类似的社会雄心。

亲爱的朋友们，

最后，请允许我向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们表示感谢，并再次表明我们作为成员国，维护和实现构成本组织存在的指导思想的那些目标和理想的坚定决心。

谢谢。
